

杨殷故居

杨殷故居位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总理大街中段，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景区辖区内。

杨殷（1892—1929），字典乐，又名孟揆，中山翠亨村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杨殷于1892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初八）出生，1911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联络工作；1912年转为国民党党员，1914年转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在上海掷炸弹把杀害宋教仁的凶手、

袁世凯的爪牙淞沪警备司令郑汝成炸伤。1917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时，杨殷任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1919年，他任职于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杨殷把自己的房屋田产和已故妻子留下的首饰变卖，积蓄及变卖所得全部交给组织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1922年底，他受组织委派赴苏俄参观学习，次年3月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1月，杨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参与组织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配合东征军回师镇压军阀杨希闵、

杨殷故居正面（黄春华摄于2020年6月）





杨殷故居大厅
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年10月）



杨殷故居内杨
殷卧室（孙中山故
居纪念馆提供 摄
于2020年4月）

刘震寰部的叛乱；“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8月，杨殷任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成员，负责军事和肃反两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工委工作。同年12月，杨殷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又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陆丰与

彭湃等领导起义部队、农军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4月，杨殷再次被推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后递补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杨殷曾到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区指导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在上海中共



设于杨氏祠堂的杨殷纪念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2021年7月）

中央机关工作时，杨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重点负责军事工作。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杨殷与彭湃、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杨殷与彭湃等保持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他们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8月30日，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彭湃、杨殷等人。临刑前，杨殷慷慨自若，对狱中难友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迈着坚毅的步伐，

与战友们一起高唱《国际歌》，呼喊着口号奔赴刑场，牺牲时年仅37岁。

杨殷故居建于清代末年，坐西南向东北，是当地典型的“三间两廊”式砖木结构建筑。正厅采用通顶式设计，直达瓦面，两侧卧室用木板分作上下两层，厨房及粮食加工间建于南面。建筑为花岗岩石板墙脚、青砖墙、硬山顶，屋檐前有精美的木雕檐板；采用西式的柚木百叶窗，窗头有精美的以岭南特色水果荔枝、佛手、杨桃等为内容、带西洋风格的灰塑装饰；正厅摆设有全套的清代酸枝木扶手椅。建筑外墙保留有清末盗匪挖墙抢掠及抗战时期日军的射击子弹孔等痕

迹。室内复原陈列杨殷在此生活时的景貌。

杨殷故居于1989年6月被广东省政府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被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布为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2011年9月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

广东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8年4月被列入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重点建设示范点，同年5月被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核定公布为中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1年7月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核定公布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延伸阅读

杨殷的家风传承

在杨殷故居里，陈列着杨殷在上海工作时写给大女儿杨爱兰的一封信：

……

你年纪已长，各事不能像从前那样。除读书外，各事不可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用钱要省，须知留得文钱，亦可于无钱时应用，切不可为了要面子，就可多用几块钱，这是青年人最要不得的事情。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有信可交催哥带来，以省邮费。以后付信来，可写上海老靶子路五洲大药房柯医生 转李云峰。

父荣示

透过这封信，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为革命奔忙、为理想献身的铁汉子的人格魅力。

杨殷深爱妻子和孩子，在妻子李庆梅离世多年后仍没续娶，使用的化名“李荣”“李云峰”也饱含着他对发妻的一往情深。大革命失败后，杨殷不仅负责党的军事、情报、肃反和工运方面的工作，还负责解决组织经费和安排同志转移等。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杨殷就专事党的工作，不仅没有收入，还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解决组织的燃眉之急。幸而翠亨杨氏族人向来“一人有事众人帮”，照顾孩子及生活费全由亲友替他承担。

尽管忙于工作，但杨殷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育。1998—2003年，笔者曾数度采访其时已年近九旬的杨爱兰。她说：“爸爸很爱我们，稍有空闲，就跟我们讲苏联人民解放的故事。他总是很忙，早出晚归，但无论他多晚到家，都会检查我的作业。我们很难见爸爸一面。即便他在家，不是和叔叔伯伯关起门来开会，就是伏案写东西。”

杨殷家境殷实，但他的钱财全都用在革命上，家里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有一次，杨殷的妻舅托人带来一只金华火腿。第二天早晨杨爱兰醒来，吵着要吃火腿。当听到已经被客人吃了，她哭道：“这是舅舅送来的，为什么一点都不留给我们？”杨殷知道后，便跟杨爱兰讲道理：“叔叔、伯伯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动者。他们辛苦做工为社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收入低微，根本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劳动者最光荣，既然有尊贵的客人来，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想吃金华火腿，等以后长大了，靠自己双手劳动所得买来吃，不是更香吗？”其实，那么大一只金华火腿，一顿怎么可能吃得完呢？在那个年代，金华火腿是十分昂贵的食物，杨殷哪里舍得吃，早就把它变成组织的活动经费了。

杨殷爱他的妻儿，爱他的亲人，更爱党的事业和劳苦大众。为了能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他勇敢地理想斗争，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他很慈爱，对我们要求却很严格。”杨爱兰牢记父亲的话，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她告诉笔者：“我一直按着爸爸的教导去做，自食其力，从不给组织增添麻烦。丈夫去世时我才44岁，带好儿女，养育他们成人是我的本分。9个儿女个个自食其力，是我最大的安慰。我退休时国家还很困难，我就不领退休金，到香港打工养活自己，一直干到79岁。”

与父亲杨殷一起生活的这三年，尽管时间是那么的短暂，却是女儿杨爱兰的永恒记忆。他那坚毅挺拔的脊梁，是儿孙们做人的准则和精神支柱。

（郭昉凌）